

【农村·农民·农业研究】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未婚先孕： 婚姻过渡的个体化困境及秩序重建

王小璐¹,王义燕²

(1. 南京农业大学 农村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2. 德州市开发区行政中心 中小企业局,山东 德州 253700)

摘要: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日益增多的未婚先孕现象,是社会流动背景下涌现出的新的社会问题。冀中某村未婚先孕女性农民工的个案,展现了未婚先孕的原因、后果及化解途径。研究发现,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未婚先孕是社会流动所引发的个体化困境;同时,个体生命历程的逆序也与社会规范互构形成了反馈环路,使既有的社会秩序和规范受到冲击和影响。当前未婚先孕危机的化解主要有赖于家庭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调停与协商,但长久来看更需要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个体化进程给予家庭以外的关爱及社会支持。

关键词:未婚先孕;社会流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过渡;个体化

中图分类号:C91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5-0041-06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增多,他们的婚姻家庭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1]其中,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等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显示,新生代(30周岁以下)农民工婚前怀孕的比例高达42.7%。^[2]回顾国内文献可知,现有研究较多关注未婚先孕的原因,有研究者指出这是农村未婚青年在生育偏好下的理性选择^[3],也有研究者认为是性别失衡下的婚姻竞争^[4],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导致未婚先孕发生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流动下农村青年的婚恋观、贞操观发生了变化,他们对未婚先孕等行为的态度较之以往更为宽容。^[5]然而,鲜有研究就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未婚先孕的过程及后果影响等展开实证的研究,社会变迁与婚恋嬗变之间的逻辑路径也有待厘清。

在西方研究者看来,结婚和生育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年轻人成年的重要标志,将其纳入“向成年过渡”(transition to adulthood)的研

究框架能够更好的解释社会情境中婚姻过渡的特征和实质。其中,社会文化理论范式认为向成年阶段的过渡除了指个体要经历生理发育的变化外,还要学习并承担本文化内有关成人角色的要求^[6],包括遵守有关婚育角色过渡的时点和顺序的规范,有学者还就此建立了个体生命历程的规范模型(normative model of the life course)^[7]。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青少年未婚先孕比例的显著增长^[8-9],个体是否“如期”进入规范性角色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研究中的重要议题^[9]。

事实上,未婚先孕是婚姻过渡逆序的表现形式,日益增加的未婚先孕使研究者意识到作为社会秩序“内在法则”的婚姻已经凸显出个体化的发展趋势,即现代社会中的婚姻正在转变成“不确定的自由”,伴随着自由、机会抑或风险和危机。^[10]也就是说,虽然年轻人在自身婚姻过渡安排上的自主性得以增加,但同时也可能会因未婚先孕而承受无形的压力,其压力来自于他们的经历不符合社会主流文化的期望,且这种非预期的过渡也容易使缺乏相应能力的个体产生紧张和不安,从而增加风险。^[11]

相较于西方传统的婚姻角色过渡规范,中国乡土社会对婚姻和生育时序的限制更为严格,男女双

收稿日期:2013-04-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YJC840036);中央高校业务经费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SK2011006)。
作者简介:王小璐,女,南京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青年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方结合成夫妇,生出孩子并共同将其抚育成人是一套约定俗成的社会活动体系^[12]。然而,近年来农村青年的生活轨迹与之前相比迥然不同,如他们外出务工的时间提前,有超过50%的人在外务工之后才结婚,且未婚先孕比例大幅度提高^[2],这表明他们的生命历程轨迹发生了显著变化甚至是婚姻过渡的逆序。那么,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而言,她们的未婚先孕是否也是伴随个体化进程所产生的困境呢?经历未婚先孕,她们的境遇会如何,又是如何处理的?她们最后能顺利的步入婚姻吗?本研究期望将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未婚先孕嵌套在复杂的向成年过渡的社会过程中,以“过程—事件”的分析视角加以质性的考察,并试图揭示出当前社会变迁与农村青年女性发展之间的互动逻辑。

二、未婚先孕: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危机

本研究所分析的个案都是出生成长于枣王村且有未婚先孕经历的80后外出务工女青年。枣王村是一个位于河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的典型华北农村,人口不足2000人,有480户人家,其中育龄妇女400余人。以往由于与中心城市距离较远,这个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交通闭塞、资源匮乏、思想保守。上世纪末,未婚先孕在村里尚属罕见,村民们普遍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2003年之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本地农村青年外出经商和打工者逐年增加,期间未婚先孕的年轻女性数量也有明显增加。截至2010年,我们了解到村里公开了的、有此类经历的家庭就有28户,其中缔结婚事的有24家,解除婚约的有4家。

在枣王村这样一个相对传统的乡土社会,未婚先孕不论是对女性当事人还是对其家庭而言都是不小的困扰。虽然最近几年村民们逐渐对未婚先孕见怪不怪了,但还是会在每年腊月婚礼扎堆的时候对此品头论足。而且尽管从总体上看,未婚先孕的女性当事人基本上都步入了婚姻,但其间的过程并不顺利。按照未婚先孕处理结果的不同,呈现3个不同的个案,其中梅梅的婚事煞费周折,而小文更是以流产分手而告终,只有清清顺顺当当结了婚。

我们先来看看梅梅的故事。梅梅与男友是初中同学,两人初中未毕业就一起辍学去了天津打工,期间两人发生了关系。第二年,也就是梅梅还

不到18岁的时候她第一次怀孕了,梅梅在男友的陪伴下打掉了孩子。后来,在年长同事的点拨下,她要求男友在中秋节托媒人来家提了亲,两边家长也为他们订了婚,但因为两个人都还小,仍旧以男女朋友的关系相处着。两年之后,梅梅第二次意外怀孕了。这次怀孕正逢在家过年,男友劝梅梅说两人还小,还不到结婚年龄,等以后挣了钱结了婚再要孩子也不迟。而梅梅不敢跟家里说,也没个主意,就是想早点结婚,用她的话来说,“结了婚就不用过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了”。结果还是梅梅的妈妈发现了端倪,问她“是不是有那事儿了,你说出来大人不怪你,你别不说,怀上了咱就赶紧托媒人把日子定了,赶紧结婚完事。可别像xxx还没结婚就让人举报了,七个月的孩子打掉了,坏了名声不说还坏了身子,自个儿吃亏”。

与梅梅一样,小文也是小学一毕业就外出打工了,后来相亲谈了朋友。在外打工的时候,男友去找小文并提出了关于性的要求,小文推脱了好几次。最后一次,男友认为小文对他不真心,说“早晚都结婚,干嘛这么着”,小文觉得不好意思再拒绝只好应允了。结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亲密接触之后小文怀孕了。“十一”回家休假时,小文妈妈在亲戚的提醒下注意到小文有点不对劲,她对小文说:“你别不好意思,就是出了事大人也不怪你,都是为你好。你要是真有(孩子)了,咱就赶紧跟人家商量商量娶过去。要是你寻思着等两天出门(打工),自己一个人去把孩子打了,到时候吃不上喝不上,再着了凉,你找谁去啊?你别寻思你爸会打你,真出了这事,你身子是最要紧的。”

清清初中毕业后,三叔给清清在城里介绍了工作,还介绍了一个在县交警队工作的男友。三叔之所以热心地给清清介绍对象,其实除了觉得自家侄女模样俊俏,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怕她自己在外面“瞎搞”,“别给那些小子脸,像旁人那样还没结婚,肚子先大了”。后来,清清与男友交往一段时间后就搬到对方家里去住了。男友对她说,“咱快结婚吧,早要上孩子早结婚,户口本出生证都好办”。等到清清真怀了孕她却没好意思说,还是怀孕三个月的时候被准婆婆看出来了。准公公和准婆婆就去找清清三叔商量结婚的事,三叔知道这件事后还挺高兴,“寻思着小子行啊,才多长时间两个人就好成这样了”。他对男方说:“那就趁早结婚,嘛也不能少清清的,户口本结婚证你们甬操心,我给办。”

从上述例子可知,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流动经历是导致其未婚先孕的重要诱因。尽管与同龄进城务工的男性相比,她们并未表现出特殊性,但如果将其与之前的农村女性进行代际比较,就会发现社会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访谈中我们了解到28户家庭中的母亲文化程度均较低,基本上都是在家务农或照料家庭。不同于母亲那一辈,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都接受过基础的学校教育,甚至还有人读到了高中毕业,她们不甘心且有能力走出乡村到城市里打工。在远离家人、单调乏味的打工过程中,她们取得了经济独立及生活自主权,能够自由恋爱并通过恋爱构建新的社会支持网络,然而这也意味着她们失去了来自出生家庭这一社会化机构的保护。因为代际之间的分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无法与母亲分享外面世界的经验,母亲也无法对她们的生活施加指导和控制,导致她们只能在偷尝禁果后独自体味苦涩。

以往研究表明,发生了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除了忍受生理上的痛苦外,其心理伤害也不可低估,她们会感到耻辱、自卑、有罪恶感,对发生的事实过于恐惧和逃避。^[13] 本研究的访谈对象也不例外,她们对未婚先孕的事实感到羞愧且本能地遮掩和逃避,与此同时她们还表现出不知所措的慌乱。当消息迫不得已被父母或他人知晓之后,未婚先孕就不再是女性当事人的个人事务,而成为整个家庭的危机。除了对名声表示担忧外,父母还要考虑女儿的身心健康和婚姻幸福,又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的严肃性、乡间邻里的闲言碎语以及事件本身的紧迫性等,他们不得不迅速作出让女儿尽早与男方成婚的决策。这样未婚先孕才能从一个突兀尴尬的难题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实。

三、婚姻谈判:家庭策略实践中的资源动员

面对未婚先孕,三个家庭的危机化解策略是一致的。但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三个姑娘都是在外务工过程中怀孕的,但梅梅和小文的未婚先孕是在父母家作短暂停留时被女性长辈无意间发现并由女方家率先作出结婚决策的。清清则不一样,清清是被准婆婆发现怀孕,并由男方家提议结婚的。诚然,这与清清婚前乃至怀孕后不在自己家居住而在男方家居住有关。但是,难道清清及她的家人没有

担心过婚前同居可能会导致的未婚先孕等后果吗?

对于这个问题,清清说她那时候没想过有了孩子没人要怎么办。后来她又补充道,“要是他不认账,他在交警队就混不下去了,再说他也不可能(不认账)”。清清所谓的“不可能”,用她三叔的话来说就更好理解了,“他家就是冲我(清清三叔)定的亲戚,要不是我能在县里混点事,凭俺二哥(清清爸爸)那样,人家也不会定这门亲啊”。清清三叔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尽管他当兵退伍后辗转了几个单位,最后在县财政局当司机,但期间早已搬出枣王村定居县城,还与清清的大伯合伙承包了公路建设工程,属于“说得上话、办得了事”的人。所以,在清清的婚事包括未婚先孕问题的处理上,三叔当仁不让地替代清清的父母成为了真正的主事人。

相较于清清,小文家境一般,也没有帮衬得上的亲戚。小文的妈妈察觉到女儿未婚先孕的时候,小文爸爸正在天津打工,她没人商量就将此事告诉了要好的邻居,之后整条街都知道了小文怀孕的事,这使得小文家在婚姻谈判中愈发的被动。小文妈妈只好找了个媒人一同上男方家去商量婚事,男方妈妈先是说“不急”“等孩子爸爸回来再定,让孩子先处着”,后来竟然又回话说,“要不照个B超,是孙子咱就娶,不是孙子就让他俩商量着办”。

小文妈妈本以为去男方家说一下,“结婚会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想到“碰到这种不说理的门户”。一气之下,小文妈妈说,“你要是不管,我家里人也不少,我加上他舅他叔一样能把你家砸了”。男方家显然不在乎这要挟,说“没事,你砸吧,家里也没啥值钱的”。眼看着说不通,小文妈妈只好生气地回了家。过了几天,男方家长让媒人传话,“小文怀孕了,这个事儿很急,要不赶紧把婚礼办了”。小文妈妈以为男方怕传出去难听,事情有所好转,于是跟媒人说,“那就看个日子,把大礼过了吧”。没想到,媒人回话“男方说没钱,赶着结婚拿不出钱来,先把小文娶过来生下孩子再说”。

小文妈妈这时才明白,男方家原来是想不花钱娶媳妇。双方拉锯了几个回合,最后男方家干脆丢下一句话,“小孩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处理,我们大人管不了”。直到这时候,小文妈妈才在家里亲戚的建议下把小文爸爸从天津叫了回来。可是面对这种局面,小文爸爸也同样没辙,一进门就说:“咱没权又没势的,摊上这样的人家,过大礼收多少钱咱都用不着,就是怕小文嫁过去受气。咱不图他什

么东西,但他们这么办太不尊重人了。”于是,在爸爸的劝导下,小文打掉了孩子并彻底与男方作了了断。

清清和小文的故事,正好从两个方面印证了在解决因未婚先孕所引发的婚姻谈判过程中,双方家庭拥有资源的多寡对事态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清清因为拥有三叔(包括大伯)这类占据当地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的能人亲戚,从而占据了完全的主动地位。所以,在未婚先孕发生后,女方一点也不着急,反而是由男方主动提出结婚事宜。小文家则正好相反,家里条件一般,也无有权有势的亲戚,甚至连叫得上帮忙制造声势的亲戚都寥寥无几。在整个婚姻谈判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小文妈妈出面,没有一个主事的男性,当然即使后来小文爸爸回家了也无济于事。所以,男方家先是无礼回避和搪塞,后来更是以未婚先孕作为降低婚姻支付成本的筹码,最终导致婚姻谈判彻底失败。

四、秩序重建:代际及家庭互动的逻辑图景

梅梅的故事和清清、小文都不一样。她家家境中等,父亲有兄弟5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因家里有人在镇上工作还算比较有地位,但后来都陆续下岗了,也就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差了。所以,梅梅家的婚姻谈判既不像清清家那样顺风顺水,也不像小文家那样以失败告终,而是陆陆续续纠缠了有四个月之久,经历了对峙、交锋和胶着三个轮回,充分展示了代际及家庭间的互动。

第一回合是对峙阶段,双方家长都不先出面,怕失去了主动权。后来梅梅妈让女儿出面把对象叫到了家里,却没像往常一样拿烟、沏茶,只是晾着他不说话。梅梅的对象也不说话,过了半个多钟头才在梅梅的暗示下对梅梅妈妈说他肯定会跟梅梅结婚,“要是不结婚也不整那事,只是岁数没到(结婚年龄)。再说,新房还没盖好呢,娶媳妇总不能娶在旧屋吧。”梅梅对象来之前显然已被父母嘱咐过,这段话的潜台词是:有娶梅梅的意愿,但由于条件局限不能立即结婚,孩子得打掉。梅梅妈妈本来把准女婿叫来却又只字不提婚事是准备让他觉得理亏、心虚,所以听了这话很生气,说:“那也不行,有了孩子总不能打了吧,再说要是弄得将来怀不上,你找谁哭去,到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你回去找大人商量吧,让你爸给个准话,要是想打孩

子可不干,有个结果了再来看小梅。要不,别怪我跟你没完。走吧,不用在这儿吃饭了。”

第二回合是双方家庭的初步交锋,男方家长主动登门拜访,女方家也联络了所有能够说得上话、帮得上忙的亲戚帮着壮大声势。男方家长带着礼物来到梅梅家,表达了娶梅梅的诚意。男方家的这种态度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受舆论压力所迫,如果不去女方家,就不能表现出要结婚的诚意,村里的乡亲们会认为是男方家不负责任,而男方父母如果去了女方家,能不能结婚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至少男方家不会再背负不道德无礼义的坏名声;再一方面,他们去女方家也是想试探下关于婚事安排比如婚期、彩礼等具体事宜的底。

梅梅妈妈则是把梅梅的大伯、二伯和二伯母都叫到了家里,由“会说话、有主意”的大伯作代表表达了女方家的意思。“论情,他俩感情好,xx也不错,能吃苦知道挣钱,是个正经孩子,咱不图别的,就图俩孩子合得来,能过日子,当大人的也放心了。论理呢,怀着孩子这个事是个好事,哪个当家长的不愿意早抱孙子,老多人结了婚怀不上,这儿看医院那儿看医院的好几年也不管用,再说俺孩子是个闺女,这事儿上闺女都吃亏,可她要是万一心想着跟xx过日子,她也会不答应那个事啊。你们家的孙子你们要是不要,俺们自个生下来自个养。”

男方家父母听了这番话,也没说别的,就说“肯定娶”“能不娶嘛”,后来又说:“要是娶的话,只能娶在前面的旧屋,先委屈一下。”梅梅妈妈则说:“没事,娶在前屋后边的新屋又跑不了。”大家伙一听这话还都乐了。梅梅大伯就说那咱看看把日子定了,男方父母则承诺回去找个懂规矩的人选个日子再来让梅梅家敲定。

第三回合双方从初步交锋上升到激烈的胶着状态,两个家庭之间的较量博弈以及家庭内部的代际冲突不断交织与重迭。本来约定好的事情,可男方父母回去两个星期后还没有送日子给女方家,甚至不让儿子上女方家去。梅梅妈妈着急了,跟梅梅大伯商量后请媒人来家吃了个饭好让他催催对方。同时,梅梅妈限制梅梅跟对象联系,也不让她说软话,她对梅梅说:“实在不行咱把孩子打了吧,再养还能怀上,咱不这么着低声下气的,看这样别你嫁过去公公婆婆都不好好待你。”梅梅妈妈也就这么一说,结果梅梅又哭又闹要去找对象。梅梅妈妈实在没办法,只好把她关在家里,手机也扣了下来,哪怕是男方打电话来也不接。梅梅妈要让男方知

道这个事不是靠发短信打电话就能解决的,得拿出诚意来。

过了两天,媒人回话“娶好娶,只能娶在旧屋,而且家具电器什么的都先不买了,买了也没地方放”,“那边正赶上盖屋,手里也没现钱,过大礼咱就过五千吧,多了也拿不出来”。梅梅爸爸当时就火了,要找兄弟去邻村砸了男方的家。但梅梅妈妈觉得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梅梅的态度也很坚决,所以只好耐住性子去找媒人,“他叔,这么着,你就说俺这边不贪你钱,也不缺你那两万块钱,可你这么着就不行了,俺梅梅养到这么大就没受过委屈。咱是订过婚的,梅梅还给你带个孙子过去,你们这么着,理上是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再说现在离婚的都那么多,怀个孩子也不算啥丢人的事儿,咱不是偷不是抢,咱是跟未婚夫自由恋爱。俺孩子也不是嫁不出去,要是这么着,梅梅娶不过去,xx要是还在家娶媳妇,俺们就让他相(亲)一个毁一个,别寻思着小子没事,别欺负俺闺女怀着孩子了就有这(分手的)心。”

最后,双方家庭各自作出妥协,梅梅和对象终于如愿结了婚,只是这个时候梅梅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有五个月了。可以说,梅梅最后婚姻的缔结要归功于代际之间的情感让步与乡土社会里的道德制约。原本梅梅妈妈应该是梅梅婚姻角色过渡过程中规范的传达者和监督者,但是梅梅的外出打工使得家长的这一监督职能未能落实,并引发了未婚先孕的危机。面对危机,梅梅妈妈虽然心有不满,但从女儿的身体和名声等各方面考虑,她不得不选择筹划婚姻这一出路。按照梅梅妈妈的计划,是打算在婚姻谈判过程中采取强硬态度的,并利用乡规民俗向男方家施压。然而,梅梅的反抗和态度以及男方家的软磨硬赖却让她不得不有所妥协,最终接受折中的方案化解了未婚先孕危机,使梅梅得以在生下孩子之前步入婚姻状态,也消解了乡村流言蜚语的传播和震荡。

五、结论与思考

本研究从未婚先孕事件切入,对当前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过渡进行了深入的探究。通过对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生活史的梳理,剖析了枣王村外出务工女青年未婚先孕危机产生的原因、后果及化解途径,也清晰地呈现了这一社会过程中社会、家庭与个人之间的互动逻辑,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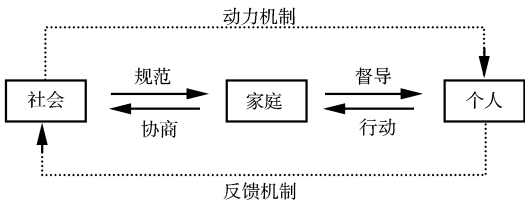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互构

1. 未婚先孕是社会流动中女性的个体化困境

众所周知,推动个体婚姻家庭角色过渡的动力机制是基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经济水平等结构性因素综合形成的规范体系,由正式的制度规范与非正式的公序良俗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的制度规范包括婚姻登记制度、计划生育政策等,非正式的公序良俗主要是指社会舆论的道德监督。原本平静运转的这一规范体系,因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而失效。一方面,教育的获得、工作的转换使年轻一代的女性能够脱离与家庭、乡村的直接联系,开启她们个体化的进程,赋予了个人生活更多选择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代际之间经验的隔阂,以及婚姻过渡参照角色的缺失,最终使得植根于传统社会价值的婚姻过渡时序和规范不再具有约束的效力。同时还不得不承认当前农村仍然是男权社会,有关“性”道德双重化的趋势丝毫没有改变,基于性别不对等的道德评判依然存在。当旧的规范部分失效、新的价值规范还模糊不定时,其男友对性的要求就成为了一种霸权和压力,使得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不得不屈从,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其婚姻家庭角色过渡的不确定性及风险。

2. 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规范互构为反馈环路

正如埃利亚斯的“交互观念”(reciprocal conception)所言,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10]21}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未婚先孕现象的不断涌现也表明个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同样会对社会系统产生输入,这种输入即她们生命历程的逆序会促使社会结构接收反馈,其结果是农村社会中的婚姻角色规范出现了某些变通和弹性的空间。这种反馈具体表现为农村外出务工青年在城市打工经历中所接触到的非传统的婚恋观以及乡村越来越多的未婚先孕事例,不可避免的会对农村既有的婚姻角色规范产生影响。村民对未婚先孕议论热度的缓和就是一个佐证,他们不再视未婚先孕如洪水猛兽。而三位未婚先孕当事人的家庭

成员的态度更是如此,虽然他们对女儿的未婚先孕也感到比较恼怒和伤心,但更多的却是对她们身体的怜惜和爱护,甚至为了女儿的幸福会不顾道德舆论的抨击主动放弃一段有可能不幸福的婚姻。

3. 家庭是化解社会一个体困境的双向调节器

婚姻过渡的逆序事件发生后,乡村社会显然更期待在预定轨道上修复婚姻角色规范。但乡村共同体力量的削弱与松散对于未婚先孕而言已经缺失了束缚及矫正的可能,而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及工作成就也远未使她们达到可以依靠自己化解危机的程度。因此,社会一个体层面的危机化解只能有赖于其出生家庭的调停和支持。尽管未婚先孕危机前,家庭在维护传承社会规范的功能上有所缺失,但危机发生后女方家庭的策略却极其一致,即通过筹划婚姻重建秩序。从女方家庭就婚姻缔结所进行的谈判过程来看,农村社会传统的家庭婚姻道德伦理仍是双方得以沟通并化解矛盾的认知前提和逻辑基础。而婚姻是否能够成功缔结,则有赖于女方家庭的资源动员与代际之间的商议和妥协。对于未婚先孕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而言,她们并没有正式的社会救助制度可以依赖,唯有依靠家庭安全网才能度过难关,所以家庭资源的多寡以及父母给予的生活和情感照顾,对于她们顺利化解危机、重新回到婚姻角色过渡的惯常轨道来说尤为重要。

总之,随着社会变迁节奏的加快、人口流动范围的扩大,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未婚先孕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与思考。女性作为人类生育的天然载体,如果缺乏应对危机的安全网,很有可能会造成生理和心理的严重创伤。而且,未婚先孕不仅使新生代女性农民工面临着不确定的风险和危机,也是对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挑战。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在社会流动背景中婚姻过渡的个体化进程及困境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加强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政府及社会组织与家庭和社区之间的联动,为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关爱和社会支持,使她们能够清楚的认识到社会变迁中的个人处境,并具备应对挑战和危机的能力,从而确保个人发展的平稳有序与社会生活的和

谐健康。

参考文献:

- [1] 风笑天. 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 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J]. 人口研究, 2006(1): 57-60.
- [2] 新华社. 人口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EB/OL]. (2012-08-07) [2012-07-28]. http://www.gov.cn/jrzq/2012-08/07/content_2199409.htm.
- [3] 吴开荣. 关于山区农村婚姻、家庭和生育控制的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J]. 人口科学, 2004(6): 74-76.
- [4] 谭同学. 乡村社会转型中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迈向“核心家庭本位”的桥村[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7.
- [5] 胡珍, 陈静. 青年农民工恋爱及婚前性行为状况研究报告——基于成都市服务行业青年农民工的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08(1): 42-46.
- [6] Willis F K, Crider D M.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nd Attitudes toward Traditional Morality A Two-Panel[J]. *Study. Youth & Society*, 1988(1): 88-105.
- [7] Marini M M. Age and sequencing norms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J]. *Social Forces*, 1984(1): 229-244.
- [8] Furstenberg F F. The Intersections of Social Class and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J]. *Social class and transitions to adulthood.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2008(119): 1-10.
- [9] Howell F M, Frese w. Early transition into adult role: som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J].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1982(1): 51-73.
- [10] 乌尔里希 贝克, 伊丽莎白, 贝克-格恩斯海姆. 个体化[M]. 李容山, 等,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1.
- [11] Bell S, Lee C. Transitions in emerging adulthood and stress among young Australian wom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08(15): 280-288.
- [12]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99.
- [13] 潘雷, 沈林平, 郭若娣. 33例农村女青年未婚先孕有关问题调查[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7(5): 303.

(责任编辑: 李良木)

(英文摘要下转第83页)

the housing prices of second-tier cities. In a short term, the impacts on housing prices have fluctuations, mainly due to the impact of provident fund polic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regional city's housing prices,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city's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fund loan policies and the living standard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minutely adjust the current fund loan policies and continue to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credit policies, in order to maximize its positive role, protect the rigid demand, and inhibit their adverse effects.

Key Words: Housing Provident Fund Loan; Housing Price; State-space Model; Kalman Filter

(上接第 46 页)

The Premarital Pregnancy of the New Generation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dividual Dilemma and Order Reconstruction of Marriage Transition

WANG Xiaolu¹, WANG Yiyan²

(1. College of Rur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The Administrative Center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Dezhou City, Dezhou 253700,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growing number of new generation female migrant workers with premarital pregnancy, which is a new social problem i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mobility. This study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reason, consequences and solutions of the premarital pregnancy in a 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stories from the premarital pregnancy females and their family numbe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remarital pregnancy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s an individualized dilemma caused by the social mobil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verse of individual life process and social norms interact and form a feedback loop so much so that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 and norms are challenged or adversely affected. The solution to the premarital pregnancy crisis relies on the mediation and negoti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initiated by the family. But in the long run, it relies more on the outside family support and concern for the individu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female migrant workers.

Key words: Premarital Pregnancy; Social Mobility; New Generation Female Migrant Workers; Transition of Marriage; Individualization